

江南周末

2026年6月12日 第1018期 编辑/陈苏 版式/夏可夫 校对/王宏伟



独家视角 读嘉呈现

江湖未远

■记者 陈苏

6月3日,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光学大楼报告厅内,大型人文纪录片《大侠金庸》正在播放。

这并非一次偶然的文化造访。

24年前的春天,金庸曾受聘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教授,徐中玉、钱谷融、郭豫适等学界泰斗亲临现场,与年轻学子一同聆听这位“武侠小说宗师”畅谈“人文因素与经济发展”。

24年后,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导演段欣,带着三年磨一剑的《大侠金庸》来到这所学府,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特聘教授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尖,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、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罗岗围坐对话,带领师生走进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江湖,讲述纪录片创作的幕后,畅谈金庸武侠的家国情怀与人文精神。

活动结束后,江南周末记者分别专访罗岗与毛尖,听他们讲述金庸与文学、金庸与江南文化,以及嘉兴这座群星闪耀的城市,如何做好活人名人文化IP,在江南叙事的蓝本中讲好中国故事。

在大多数观众认知里,金庸就是那位写下15部武侠小说,塑造了郭靖、黄蓉、乔峰、令狐冲等经典武侠人物的文学大师。“时代与金庸是相互成就的。”罗岗觉得《大侠金庸》最核心的叙事策略是不仅从文学角度塑造了金庸,“还让我们看到金庸背后那个更博大、更丰富的一个叫查良镛的人。金庸是建立在更丰富的查良镛之上的。他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作家,虽然写的是武侠小说,但回应着的是大时代变化。”

正如段欣所言:“我们从最初的‘看山是山’,以为他就是一个武侠小说家;走近以后才发现,他本人的丰富性完全不亚于他小说的博大精深。”

纪录片没有停留在“武侠小说宗师”这单一标签上,而是用三集的体量,按照时间线索,讲述他少年离家,在抗战烽火中辗转求学;青年赴香港,从电讯翻译做到编剧、导演;中年创办《明报》,身兼社长、总编、主笔三职;晚年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,为香港回归贡献智慧。这些鲜为人知的经历,像一把把钥匙,打开了理解金庸武侠世界的新路径。我们读懂了查良镛如何成长为金庸,如何双手互搏、左右开弓,以如椽之笔为华人撑起一片文化天空,如何重情重义,成为满怀家国的“大侠金庸”。

段欣坦诚地分享了创作《大侠金庸》的艰辛。从业近30年,这是她职业生涯中“难度最大的一部作品”。认知的颠覆、材料的驳杂、取舍的艰难、现实的叩问,以哪条线索为主?如何打动没读过金庸的年轻人?团队花了整整一年做历史调研,足迹遍布内地、香港及英国、日本;带着这些疑问,远赴英国探访《射雕英雄传》英译本的出版情况,“很多专家认为金庸小说太中国化,西方读者get不到精髓。但我们发现,实际情况非常喜人。”

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。”这副对联,几乎是几代华人共同的文化记忆。罗岗回忆起青年时代的“金庸热”:“拿到金庸小说,我上午看完,下午就传给毛尖老师看,毛老师看完,晚上还有人在等着。毛老师当年有个‘壮举’,就是买了一套三联版金庸小说全集,我们都特别羡慕。”

毛尖一开口便带着她特有的犀利与坦率:“我们这一代人,青春期是金庸给的,爱情观是金庸给的,道德观是金庸给的,连近视眼也是金庸给的。”那种披星戴月、废寝忘食的阅读体验,是今天刷短视频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。

“金庸对于我们这代人有很重要的意义,把我们理解的航道重新建构得更加宽阔。”金庸笔下有很多亦正亦邪的人,包括韦小宝,他们的存在打开了伦理的界限,“以前我们觉得英雄都是少情欲的,好像情欲越低道德水平越高。但金庸笔下,情欲越高往往越有魅力。萧峰、杨过、令狐冲……他们不是完人,正是这些‘不完美’让我们觉得真实、可爱。”

活动现场,一位特殊的观众引起注意。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,也是金庸的同乡。他的学生问他“孩子出国怎么学习中华文化”,他建议带三本书,一本《诗经》、一本神话、一本金庸小说,“金庸的作品不仅是一部武侠小说,更是文化层面上的家国乡愁。”罗岗深以为然,“金庸讲故事的方法,是讲到中华文化里去了。”

纪录片《大侠金庸》走进华东师范大学,不仅是一次校园观映活动,更是一次文化记忆的唤醒与传承。当年轻的面孔在光影中凝视那个传奇——看他如何在战火中求学,在报馆里疾书,在书桌前创造那个充满侠骨柔情及家国大义的江湖,金庸的意义便超越了文本,成为一种活着的文化基因。

一个人与时代的双向奔赴

金庸火热了一个时代。他的小说逐步走进经典文学的殿堂,这是作品本身的硬度,亦是与一个时代的双向奔赴。

“时代跟金庸相互成就,时势要降临给有准备的人。”罗岗从文学史角度讲述了金庸小说的经典化,“很多作品刚出现时,都是通俗的,然后慢慢经典化。比如《红楼梦》是通俗的,当时,明清小说都难登大雅之堂,但慢慢经典化了。”为什么有的通俗文学能够经典化,而绝大多数不能?“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它超越了这个类型。”

像陈省身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之所以喜欢金庸,罗岗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“他对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承载,而且这种承载不是直接灌输,是有机融合到武侠小说类型中”,包括佛道儒经典,乃至衣食住行、琴棋书画等。“《天龙八部》不仅是一个曲折的故事,还形成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酿造出来的境界紧密相连的氛围,更高级的读者透过这个故事、情节、人物,体会到了金庸小说背后的独特氛围。”

即使在武侠小说这个类型中,金庸也达到了极致。“他写了反武侠小说《鹿鼎记》,解构了武侠世界,可以说,他是中国武侠小说空前绝后的一代——‘绝后’的意思就是在他后面的人都要受他影响,或者活在他的阴影下,或者干脆写不出来了。”

毛尖则从另一个角度回应:“这个话其实并不准确,因为金庸一直是通俗的,只是因为我们对经典的理解改变了,而不是金庸从通俗走向经典,是时代在变化。”

经典化不是文本属性的简单位移,而是金庸小说与时代语境互动的结果。“时代肯定造就了金庸。金庸当年会被很多人阅读,是因为通俗好看,又和之前的故事有区别,时代为金庸小说的畅销打开界面,金庸的武侠也是时代的关系。”

今天,已经有很多人不再读金庸,“但金庸小说的魂魄,始终散落在华文世界的流行文化之中。”罗岗这一观点得到毛尖共鸣,“金庸小说对中国文学有很多继承,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套路,尤其武侠小说的套路其实都是被金庸设定好的。”

她敏锐地观察到金庸作品还是时代的“风向标”和“度量衡”,“我们这代人最喜欢乔峰,他是大英雄。但前两年的金庸人物排行榜里,周芷若进了前十,连灭绝师太也因为表情包进入青年亚文化。”她虽曾表达过对金庸小说走出主流视野的惋惜,“曾经我们偷着看金庸,而现在却只能靠课程补充。金庸已经淡出这一代学生的生命了。”但依然觉得金庸在当下的意义反而更加凸显,“我一直觉得金庸小说应该列入青少年修养。光见义勇为这一点,在他的小说中反复重申,就是特别重要的。它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的气质,包容一个时代的容量。尤其在今天侠义、义气都逐渐凋零的时代,你看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会这么火,也是因为这种情绪今天失去支点了,大家会觉得原来过去还有这样动人的东西。金庸的小说大量讲述的就是这些故事。”

“这个江湖不仅扩容了孔子对正义的解释,捍卫了司马迁的游侠正义,还在主流价值观的赛道旁,开出了辽阔的行人道。这个行人道,为无数在主流赛道里气没平、愤难消的芸芸众生,点了灯。”

在毛尖看来,这是金庸武侠小说最重大的社会意义。

金庸笔下的人物从未被封存在上世纪的旧报纸里,而是一直活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,不断被重新发现、重新诠释。

毛尖的一段话,或许是对金庸与这个时代关系最好的注解:“金庸的武侠小说,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,是荷尔蒙的去处,拓宽了对爱与恨的理解,扩展了生命的边界。金庸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‘现在时’,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。”

江湖有约,侠客行远

—《大侠金庸》走进华东师范大学—

嘉宾对谈



图片由主办方提供

金庸生于江南长于江南,作品是否深受江南文化的影响?江南文化又是如何内化为他笔下的乡愁的?

对此,罗岗与毛尖给出了互补视角。

罗岗不认可简单的传记式批评:“出生在哪里,就受哪边文化的影响?金庸的特殊性在于他很早就离开了家乡,走了很远的路,香港五方杂处,各种因素结合。他的魅力恰恰是超越了江南文化。”他举例说,金庸最喜欢的几个男主角——乔峰、郭靖、胡斐,“哪里是小桥流水?都是大开大合,更多偏向燕赵男儿慷慨悲歌。”

罗岗认为,金庸对中华文化的把握是“大中国”视野,“金庸也是历史学家,对中国历史的理解非常深入。”他写的《袁崇焕评传》很多历史学家都觉得不亚于专业学者水平。他写金朝、写元朝、写成吉思汗,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,乔峰这个角色更是如此。“所谓‘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’,‘民’指的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、底层的这些人。这也是金庸小说超越一般武侠、立意更高很重要的原因。当然,金庸也寄托了对家乡的情感,开篇就写烟雨楼,写江南七怪,但不能简单地从江南文化去讲金庸,他是从江南走向世界,走向一个大中国。”

毛尖则从另一个维度切入。她首先纠正了一个刻板印象:“这里面有一个误会,就是大家都觉得江南很柔弱。江南士子是很有风骨的,抗战中北方和南方都有很多为国捐躯的人。”

在她看来,江南文化进入金庸,是“让金庸武侠小说更加好看”的审美要素:“一边杏花春雨,一边江湖血雨,这种空间建构是金庸特别拿手的,更有对比感,更强烈。”李莫愁在荷塘里唱“问世间情为何物”,然后马上出手打人;黄蓉开始女扮男装,到了江南换回女儿装。

“江南女子与看上去文弱的书生,因为叠加了文化资本,显得更漂亮。才子佳人叠加武侠,让武侠有一种文人气质,更具中国士大夫气质,让侠骨柔情更好看。”金庸的复调叙事与江南的腔调相结合,飞花摘叶很锋利,烟雨楼里打起来既有中秋月圆,又有江南市井,这样才好看,但江南绝不是柔弱的代名词,“侠本身包含了一种江南气质。你想想‘荡气回肠’四个字哪一个不和侠有关?”

“‘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’的调子很高,但他所有的侠都有落地的一面。市井烟火,尤其是江南的烟火为金庸小说创造了非常好的地基。”毛尖的阐释独辟蹊径,“金庸很能写酒馆子,能写各地的东西,说到底英雄也要吃小笼包的。”黄蓉最迷人的时刻不是在排兵布阵,而是她系着围裙给洪七公做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,“金庸武侠既有风骨又有血肉,血肉是靠市井烟火垫进去的,没有这些,他和老百姓勾连的一面就不会那么处得来。”

她提出了“胃的离散”这一概念:“海外华人,说起舌尖上的故乡,每个人都有话说,用洪七公也能拿下全世界的海外读者,离散的胃被集合起来了,这比兰花拂穴手还要精准。”语言能寻找很多人,乡音很久听不到的人,通过小说能回顾一下,金庸写的西湖醋鱼、嘉兴粽子,能把所有人集合起来,“金庸小说不仅让人在精神上满足,也让你的胃暖和了,人心就不慌了,‘胃籍’是真正的慰藉。”

两种视角看似分歧,实则互补;罗岗强调的是金庸超越地域文化的格局,毛尖强调的是江南文化为金庸小说提供的审美质感与叙事张力。金庸既非被江南文化“框定”的作家,也非与江南无关的“飞来峰”——他生于斯、长于斯,又以更宏大的视野将江南纳入“大中国”的文化版图,同时用江南的市井烟火与乡愁,为“侠之大者”注入了血肉与温度。

一个城市的江南叙事

金庸的家乡嘉兴,不仅走出了金庸,还有王国维、徐志摩、茅盾、丰子恺、朱生豪…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里,这座地级市的文化密度令人惊叹。

如何看待这一名人文化现象?

罗岗从江南文化的历史脉络给出解释:“明清两代中国文化的中心逐渐迁移到江南,经济发展、文化繁荣,嘉兴、杭州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江南文化兴盛之地。”1840年之后,上海最早开埠,欧风美雨最先来到江南,特别是江浙沪一带,“传统和现代融合,传统本身根基深厚,既有经济实力,也有文化实力,当然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人才。江南人受教育程度高,无论是科举考试,还是新式教育后考大学或者出国留学的基数都很大,各种各样的人物就出现得多了。”

毛尖的回答则带着江南人特有的自信与松弛:“我是浙江人,家乡宁波和嘉兴也很近。我们浙江本来就是中国文化非常完整的一个元宇宙。”浙江话里保留了非常多的文化层次,有俗语也有雅词,“当说起家乡方言时,人人都是词汇量很大的人了”。嘉兴和宁波这样的城市生来在海洋文化边上,已经站在比较文明的顶尖,同时和各种文明接触,江南的空间诗学“天然为影视小说创造了一个宇宙空间”。

如何在江南文化叙事中,激活嘉兴名人文化IP?

罗岗觉得首先要以嘉兴为主导,对名人文化做深入、系统的研究,梳理彼此的关联和共性,勾勒出内在的联系,无论是家族的联系还是交往,然后在此基础上提炼城市文化精神。“这也是《大侠金庸》对嘉兴名人文化研究的启示,提供了一个样板:要做就要站位高一点、视野广一点,档次高一点。”

从文旅开发角度,罗岗还给出具体建议:“比如伦敦,根据小说在贝克街221B打造了福尔摩斯的住所,比如都柏林,布鲁姆主编《都柏林文学地图》串联萧伯纳、乔伊斯、王尔德等作家。”金庸小说中不乏与嘉兴相关的经典场景,“江南七怪在醉仙楼上喝酒,很热闹,写了江南风物,各类人物粉墨登场,我们有没有把金庸小说的场景联系起来?”

大家都叫江南文化,杭州也叫,苏州也叫,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,嘉兴如何做好江南文化文章?

罗岗的回答冷静而务实:“你要讲好自己的故事,要找到嘉兴的特色,这很关键,讲不出特色,就会雷同。”在他看来,嘉兴是红船起航地,有丰富的名人文化等独特资源,“是不是发掘出来了?怎么串起来?老百姓是不是都知道了?怎么传播出去?”

从学术研究、文化挖掘,到点位设置、交通构建,再到推广传播、文旅开发,这是一个体系化构建。

毛尖则从文学与影视研究角度提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建议:长三角应该“以江南文化为C位,创造一个日常生活的同盟军”,不是经济同盟,而是“日常同盟”。“我们共饮长江水,吃的东西,服饰、语言、生活习惯都相同,欣赏的人、美人、英雄也有一致性。这种日常同盟可以同建我们的美学、长三角的文化。我们可以用长三角的文化日常共同体创造一个热气腾腾的未来。”